

2004 台灣小說概況

◎ 藍建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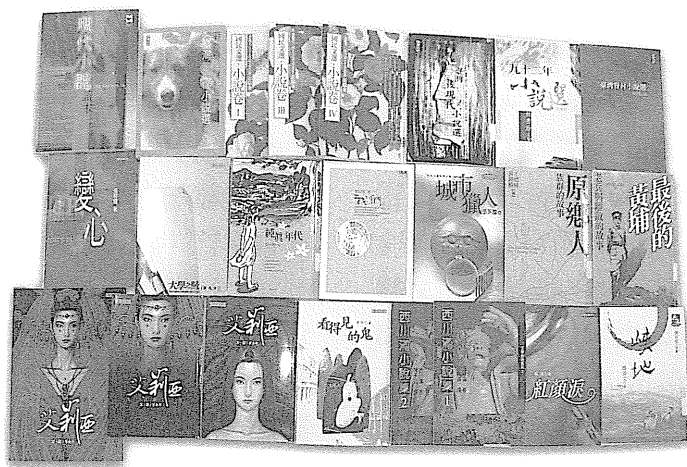


圖4 2004 台灣小說書影集錦。(陳秋萍 攝)

一、這個時代的桂冠

可喜的我們的這個時代，小說家一再備受期待，甚至尊崇如明星、偶像。但可怪的是，這些現象只出現在文藝圈中，也就是評論者筆下、小說迷心中，再不然就是政府文化單位的首長致詞，當然最多的還是集中在出版社的行銷廣告裡頭。儘管同時除了書迷外的絕大多數人，仍舊以詭異的角度看待寫小說或者文藝創作這回事，這也使得我們不知該以忽略還是睥睨來形容這些人的眼神，就姑且名之為詭異吧。

先拿文學獎這件事來說。公私機構成立的文學獎，在近十年可說是有增

無減，這當然值得欣喜。畢竟，這些文學獎雖然獎項有大小、名聲有高低，但一致的是為參與者提供了一種直接有效的寫作誘因。新增最多的仍屬公家機構，亦即由中央層級的文建會，或者地方政府的文化局所主辦的地區性文學獎，例如竹塹文學獎(新竹市)、大墩文學獎(台中市)、中縣文學獎(台中縣)、花蓮文學獎、吳濁流文藝獎(苗栗縣)、大武山文學獎(屏東縣)、玉山文學獎(南投縣)、南瀛文學獎(台南縣)、桃園縣文藝創作獎、府城文學獎(台南市)、菊島文學獎(澎湖縣)、磺溪文學獎(彰化縣)、台北文學獎、基隆市海洋文學獎、鳳邑文學獎(高雄縣)、高雄市文藝獎(前身為打狗文學獎)，還有新辦

一兩屆的蘭陽文學獎（宜蘭縣）、浯島文學獎（金門縣）、雲林文化獎（雲林縣），最久的則是南瀛十二屆。推動文化事業近乎成爲地方各縣市的共識。如是累積起來，爲我們的文藝創作增色不少，也增添了許多的生力軍。

對照之前幾年，整個 2004 年文學獎小說獎項的得主名單，也的確有推陳出新之處。曾有獲獎經歷者算起來並不多，像是以〈王爺〉、〈道德社〉分獲寶島文學獎首獎與宗教文學獎佳作的郭漢辰，即曾在 1999 年奪下大武山文學獎散文第一名（〈重量〉）；文建會台灣文學獎短篇第一名得主陳建志（〈自己的房間〉），亦曾以〈看不見的鏡子〉獲得 1999 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推薦獎；時報文學獎短篇評審獎的許琇禎（〈我只是借停一下〉），在 1998 年得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佳作；以〈黑黑黑〉、〈一部無關蟹足腫的紀錄片〉分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短篇佳作與夢花文學獎短篇首獎的高翊峰，也有過 1998 年國軍文藝小說金像獎的紀錄；鄭宗弦〈金棗嬌〉、〈紅龜心事〉，分獲蘭陽文學獎小說第二名、大墩文學獎短篇佳作，在此之前即有多次兒童文學作品獲獎；竹塹文學獎小說二獎（〈重逢〉）、鳳邑文學獎小說佳作（〈送終〉）的李良安，1999 年即以

〈祂〉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推薦獎。其他諸如時報文學獎短篇首獎楊孟珠、鳳邑文學獎小說第三名的張耀仁等等，亦皆如是。除此之外，得獎名單中的絕大多數幾乎都是全新登場。

由大小獎項構成的 2004 年得獎名單當中，重複出現的名字卻也不少。譬如李秋慧即有〈河壩〉、〈再見王船〉、〈窯情〉、〈八景尋憶〉，分獲文建會台灣文學獎短篇佳作、大武山文學獎短篇第一名、玉山文學獎短篇佳作、菊島文學獎短篇佳作；邢臺明以《魔蝎》、〈馬可的故事〉，獲得皇冠大眾文學獎首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短篇優等獎；寶島文學獎短篇評審獎得主黃心怡（〈浮光掠影〉），亦以〈記者〉獲得身心障礙者文薈獎極短篇第三名；蘇家盛則以〈決定養鴿的那日午後〉、〈李普陣亡了〉、〈光塊之屋〉，分獲大墩文學獎短篇第一名、中縣文學獎洪醒夫小說獎首獎與吳濁流文藝獎散文首獎。至於中國時報文學獎短篇首獎的楊孟珠（〈因〉），還以〈公園裡的父親〉、〈比戀愛還恆久〉、〈凶暴之年〉，獲得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優選、故鄉的文學記憶散文獎佳作、蘭陽文學獎散文佳作。

以六、七年級居多的這些得獎者，

他們的作品是否能如時報文學獎編者按語：「新的小說浪潮隱然成形」，此時恐未易論斷。勇於下筆、樂於嘗試，大概可說是這批受到新浪潮一語期待的作家之通性。換個角度來說，寫作之際也就難免基於一時興起、有感而發，而非建立在素材的詳實鑽研與意義的反芻提煉。

郭光宇〈我不是故意的〉勇奪年度大獎之一，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大獎，處理了近年來熱門的社會話題——詐騙與詐騙集團。極為激賞的評審者之一張大春，即表示作者「寥寥數筆把一個我們習稱為歹徒的背景，勾勒得非常鮮明」。在作者的想像中，詐騙者之所以淪為詐騙者的根源，乃是不景氣席捲社會導致失業。換言之，透過第一人稱的娓娓道來，至少故事中的主人翁多多少少被除罪化了。這是作者理解的詐騙及其社會原因。如果這篇作品只是個浪漫傳奇那也就罷了，當然這樣的可能性也的確存在。然而，〈我不是故意的〉卻再三暗示這個社會問題的成因就只是如此。作者對於詐騙現象的書寫，到底是基於深刻的認識、掌握，還是感情衝動，大概從其得獎感言可見端倪。不論如何，現代主義的反英雄一如〈我不是故意的〉敘事者兼主人翁，走到二十一世紀的

今天，是否也在暗示我們，每個人都有他不得不為的難處，只要有這樣的難處也許就具有行動的正當性，說起來似乎詐騙也就情有可原了。是嗎？

再看另一個重要獎項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獲得評審獎的許琇禎〈我只是借停一下〉，透過兩個無名男女一趟公路之旅，進一步展示了現代反英雄；莫名其妙闖入濱海公路荒廢小鎮的一男一女，有如走入中世紀異質空間，評審者之一的朱天心則讚賞為「精確」描繪「敗落荒蕪的省道小鄉鎮」。的確，對於蜻蜓點水般接觸過荒廢鄉鎮的局外人來說，這個三號省道濱海公路旁的住家及其居民，就像極了來自中古世紀的人物。然而，經由這種局外人的視野所見，再加以放大誇張之後，〈我只是借停一下〉卻被以「超現實」、荒謬美學視之，暗示著具備真理的洞察能力。原來，超現實主義就是如此，荒誕不經就是這樣。只要作者把裁縫機與絲襪美腿拼湊在一起即可，剩下的就留給評論家與讀者自行聯想。但結果很顯然的，除了超現實主義的同道中人，大多數讀者恐難具備這種非凡的真理洞察能力。

寶島文學獎首獎郭漢辰〈王爺公〉，則延續鄉村、民俗、地方文史掌故一類的書寫偏好。以王爺公信仰

為背景，企圖勾勒出陳雲飛、柯順天兩人之間的競爭關係，爭奪目標從王爺公的人間代理人——管委會主委，到神秘女子阿蘭；同時也從陳、柯兩人的青年時代一直延續到分別與阿蘭所生的下一代阿成、阿猴。在作者斷斷續續的講述中，這場爭奪故事來到最後，柯順天在陳雲飛病故後不久也離開人間，而看似獲得勝利贏得主委職務的阿成，卻被精神異常的阿猴放火燒掉王爺公廟。常民信仰世界裡頭有關神明人間代理人的爭奪，原本是一個可發揮的有趣題材，然而在作者筆下似乎已被浪漫化、傳奇化、過度簡化為兩個男子遠自青年時期結下的樑子。這樣的作品或許適合以心理分析加以界說吧。

相較於許瑋禎之刻意以離奇的場景、人物來演出所謂現代生活與現代人的荒謬性，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蘇敬仁的〈初級商務英文會話〉，則以遠為樸實的方法，透過平凡庸碌的上班族，藉著一次偶獲的學習英語契機，簡短回顧了即將步入中年的生命軌跡。儘管這類主題絲毫談不上新意，但貼近生活，也出發自生活，再從生活中感受問題，追索意義。就此而言到底值得加以鼓勵。進一步思考這樣的生命軌跡之形成，及其與現代

社會、現代人生活方式的複雜關連，或許將是作者一生寫作不盡的問題與素材。

在地區性文學獎當中，獲得洪醒夫小說獎首獎的蘇家盛〈李普陣亡了〉，亦恰巧涉及了熱門話題詐騙的處理。聚焦於老廟祝李普與中年同居人阿珠，兩人之間二十餘年的離合過程，藉以勾勒李普一而再、再而三遭到阿珠誑騙的紀錄。全文的主要意念即在於主人翁姓李名普與「離譜」之間的諧音，企圖表現一種離譜而荒謬的人生樣態。歲月匆匆，李普如是渡過了大半輩子，最終只獲得一則「離譜」的人生感悟。評審者認為「作者以充滿創意、幽默、嘲諷，但又不失溫情的筆觸，刻劃小人物的生命姿顏，敘事固然稍嫌零瑣，卻自然散發令人動容的文學張力」。

除了宗教文學獎以精神安頓為主、法律文學創作獎以法律相關議題為核心之外，初步就題材面加以觀察，文學獎得獎作品確實涵蓋了一定的內容，尤以各種現代人物的精神狀態較獲青睞。比方說全國學生文學獎大專組小說一、二、三名的〈神明〉、〈紅綠燈〉與〈鼠鼠鼠〉，分別針對中年失業男子背負沉重壓力與家庭期待的狀態；醫學院學生之於患有偏頭痛怪病的同窗不知如何拿捏分寸相處；以及

爲了從舊日同窗、妻子、女兒贏得男性尊嚴而天天上健身房卻對老鼠不知所措的丈夫。其中〈紅綠燈〉一篇，在營造應然與實然之間的張力與呈現主人翁不知所措的心理內涵上，確有可觀之處。另如時報文學獎短篇首獎楊孟珠〈因〉，多少企圖聚焦於父親出軌後遭受家庭混亂的子女心理，在一種類似漫長而扭曲光影的黑夜旅程之中，以幾段穿插議論的瑣事，拼貼出子女的後父親出軌年代記事。這幾篇小說的焦點也從而離開了小說的敘事傳統，進一步朝向現代心理抒發渲染、文字虛構空間營造，一發不可收拾的議論氣氛，不斷行進。

總的來看，以文學獎徵選爲中心的文化生產，帳面上是好看多了。然而，有時我們卻也不免浮現這樣的疑惑，到頭來除了年度小說或各類選集編選者，及專文介紹者之外，到底會有多少讀者能夠接近這些得獎作品？尤其是日後這些得獎者無法接二連三寫作、發表、出版的情況下，得獎名單中的大多數是否只能成爲文化當局執掌事業推動成果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好比每個年度的博碩士論文，往往化身爲圖書館汗牛充棟而乏人間津的一個個磚塊。在我們身處的這個稱得上速食的年代，「經得起時間考驗」這句話，

似乎再也難以輕易用來對待這樣的問題了。如果我們所要求於這些文學獎新秀的只是日後成爲文壇中堅，或許倒是可以樂觀以對，正如陳雨航在其年度小說選中所稱：「多位年輕的寫作者，經由文學獎的屢次上榜，不旋踵已爲文壇矚目，成爲中堅作家幾乎是指日可待。」

另一個引起遐想的問題則是，如是製造出的得獎者，是否在誘發、鼓勵繼續創作的邏輯下，能夠不斷砥礪個人的寫作與創新，甚至一種嚴肅的創作態度？再者，如同經典成就過程的文學獎評選邏輯，文學獎在賦予得主聲望與桂冠的同時，也給予他們信心與傲氣，而非謙虛與學習，那麼又有無這樣的可能性，充其量只是創造出許多的慢性大頭症患者？特別是當得獎者擄獲大小獎項之際，此時恐已如同登泰山的心境。這個可能性的癥結之一，當與徵選、評論過程中涉及價值與意義的賦予有關。

二、新舊激盪下的小說創作與出版

整個 2004 年，小說的出版雖然稱不上豐收，但也非一片沉默。幾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中，最爲特別的當屬各類選集的相繼問世，其次則是舊作新

版重出。

在各類選集方面，從年初到年底分別有：蘇偉貞主編《臺灣眷村小說選》，黃宗慧主編《臺灣動物小說選》，林秀玲主編《92 年小說選》，齊邦媛、王德威主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李喬、許素蘭主編《客家文學精選集·小說卷》，周芬伶主編《臺灣後現代小說選》，彭瑞金主編《國民文選·小說卷》，許俊雅、應鳳凰主編《現代小說讀本》，楊佳嫻主編《臺灣成長小說選》，王德威、黃錦樹主編《原鄉人·族群的故事》，張寶琴主編《聯合文學二十年短篇小說選·1984~2004》。上列 2004 年的成果，可說延續近年來常見以特定類型、特殊議題為編選的選集，只是顯然為數更多。至於此一情況是否與大選年有關，值得將來有心人士去解讀了。

以眷村、退伍老兵、榮民為核心，《臺灣眷村小說選》與《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恰好形成一組對照，現實社會中最後的眷村雖然已經拆除改建，老兵、榮民雖然一一凋零，但這兩部選集仍然為我們、也為戰後的台灣文學，留下了重要的歷史課題，有心人、感興趣者仍可以之為入門，藉以窺探這段多變而不無詭

異的戰後歷史軌跡。《客家文學精選集·小說卷》、《原鄉人·族群的故事》則是同一段歷史歲月的另一種產物、另一些聲音與立場。客家文學、文化在近年來頗受當局的青睞，認真推動了一些工作，學院裡頭也不乏相關的課程，儘管客家文學的界定，就類如原住民文學，甚至整個台灣文學的界說一般，多少存在著一些疑難雜症、懸而未決。

黃錦樹、王德威共同編選的《原鄉人·族群的故事》，編入了台灣社會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族群作品，包括閩南、原住民、客家人與馬華等部分，例如：賴和〈一桿「稱仔」〉、呂赫若〈月光光〉、鍾理和〈原鄉人〉、葉石濤〈潘銀花的第五個男人〉、田雅各〈最後的獵人〉、李永平〈圍城的母親〉。這樣的編輯方式不無和解、協商、共處對話的意味與痕跡，只不過編者前言中再三針對台灣社會族群分類對抗活動的譴責，難道不會抵消和解、協商一絲一毫？譬如這樣的說法：「我們生得其時，敢說今天的族群問題還不至於血肉相殘。但看到『族群融合』大纛之下蠢蠢欲動的民粹風潮、沙文主義，不能不嘆為觀止——吃了人還不吐骨頭，寧不更為可驚？」至於「血肉相殘」云云則無疑暗示著

論述族群關係的特定前提。

《臺灣後現代小說選》、《臺灣動物小說選》、《臺灣成長小說選》，與蘇偉貞的《臺灣眷村小說選》，連同前年的《臺灣現代文學選》、《臺灣報導文學選》、《飲食文學選》、《臺灣科幻小說選》、《臺灣自然寫作選》等等，共屬二魚文化的系列出版品，看準台灣文學堂堂進入學院、列入課程所帶來的需求擴張，自是無須贅言。

對於各式各樣的選集來說，重要的問題當不只是編選者開發出一個新的、或者挪用既有的議題範圍，在此前提下隨意展開個人偏好的作品收集。這樣的選集充其量只不過完成了編選者個人的一家之言，對於遠為重要的由議題延伸而出的作品代表性問題，恐怕只能擱置、忽略。不論是針對「眷村」、「族群」、「客家」，還是「後現代」、「成長」、「動物」小說一類議題範圍的編選，編選者是否提供了恰如其分的核心論述、完成界說，同時在此一界說上展開作品的羅致，其實仍應成為所有選集編選者的共同課題。

至於小說家的個人選集，則可視為舊作重出的一個部分。包括了琦君《菁姐：琦君小說選》，汪笨湖《汪笨湖人生小說》，葉石濤《三月的媽祖——

1940 年代葉石濤小說集》，劉枋《小蝴蝶與半袋麵——劉枋小說集》，朱西甯《現在幾點鐘——朱西甯短篇小說精選》，黃國峻《黃國峻紀念合集》。

其中，葉石濤整個四〇年代的創作，在此之前僅有《文藝台灣》上頭的〈春怨〉、〈林君寄來的信〉，與戰後初期的〈三月的媽祖〉、〈天上聖母的祭典〉等作，因收入相關選集、刊物專輯裡頭而較為人知，此次結集《三月的媽祖》，相信有助於認識葉石濤跨越日治、戰後初期一直到五〇年代的寫作軌跡甚至精神變貌。對於戰後初期紛擾多時的一些問題，或許也能提供來自文本的探討基礎。至於常青樹琦君、因扣應節目聲名大噪的汪笨湖，以及逝世不久的朱西甯，多少有關乎上列舊作的重新出版。2003 年因故選擇結束生命的黃春明之子黃國峻，聯合文學也在 2004 年為其推出了《黃國峻紀念合集》，收錄出版社發行的 5 本小說集。稍晚，另一個青年作家袁哲生也選擇了類似的方式離開人間，除了作品之外，同樣留下了諸多錯愕與遺憾。

其他選集則為大小文學獎的作品合集，譬如《文雨飛揚——蘭陽第三屆青年文學獎作品集》、《高雄市打狗文學獎得獎作品輯·二〇〇三》、《書寫青

春——台積電青年學生小說暨書評獎合集》、《菊島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第六屆》、《台中市大墩文學獎作品集·第七屆》、《寶島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第五屆》。

包括舊作新版及零散短篇結集的舊作重出，最吸引論者矚目的焦點之一，當是張愛玲的《同學少年都不賤》，儘管「張學」的研究已近乎汗牛充棟，但這篇新發現的短篇〈同學少年都不賤〉或許將帶來另一股討論風潮。此外，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黃玉燕譯）的出版，可說是延續九〇年代末以降對於日治時期在台日人作家的關注，諸如西川滿（陳千武、葉石濤各譯一卷之《西川滿小說集》）、佐藤春夫（邱若山譯《殖民地之旅》）、庄司總一（黃玉燕譯《陳夫人》）等人的相關作品，多少有助於日治時期特別是戰爭階段的議題探討。畢竟一直以來，學界對於日據時期在台日人的研討，大多難以直接根據文本展開，而停留在外部政治變數與作家之間的互動問題，更別說某一部份的討論根本連作品都沒有完整看過。當然，透過翻譯所展開的研究限制，終歸無法完全排除，但中譯本到底還是帶來了若干的正面作用。其他像是張系國《黃河之水》、王禎和《香格里拉》、王尚

義《狂流》、馬森《夜遊》、顧肇森《貓臉的歲月》、黃凡《慈悲的滋味》、鍾肇政《魯冰花》，以及師範（本名施魯生）的多部小說如《苦旱·燃燒的小鎮》、《與我同在》、《慧眼》、《緣》、《遲來的幸福》、《百花亭》、《沒有走完的路》、《穀倉願望》等等。這些作品的重出，年代上，跨越了日治時期、戰後初期、五、六、七〇年代，直到八〇年代，顯然與市場的閱讀、購買需求較無直接關聯，反倒與台灣文學的研究需求有關，儘管說很難直接論斷這些作品的再次問世究竟是基於怎樣一種標準、依照哪些人的研究需求。

關於全新的短篇結集與新作單行本部分，則可援用近來慣常的概括方式進行說明，所謂老將新銳競逐是也。

在資深作家方面，繼2003年以《躁鬱的國家》復出文壇之後，黃凡再次推出《大學之賊》。類似《躁鬱的國家》之召喚舊作氛圍，《大學之賊》再次以八〇年代《反對者》曾經處理過的大學院校人事權力關係題材及其背景展開鋪陳。這兩部作品可說是黃凡沉潛多年、但默默關注台灣社會演變的觀察心得。繼《躁鬱的國家》之後，黃凡以一貫的嘲諷手法，推出了《大學之賊》被讚許為「台灣長篇小

說的里程碑」。透過參禪與佛學哲理的接觸，這位八〇年代的小說家此次又企圖控訴些什麼呢？以大學錄取率突破百分之兩百為開頭，這一頗富黑色喜劇味道的開場，到了後來卻發展成爲類似於九〇年代初期的另一部長篇《財閥》，幾乎成爲家族爭權奪利的大學版本。原本或許有關於台灣社會裡大學發展政策的黑色喜劇，就這樣在充滿人事權力鬥爭與佛學哲理議論的文字之中，草草了事。

於此在在可見，一部以社會問題爲構成的長篇小說，其核心意義、中心問題如果欠缺清楚且深刻的認知基礎，就算一個具有豐富寫作經驗的小說家，也極難寫出具備豐富可讀性又能提供獨具一格的認知意義。

對一個曾經在八〇年代叱吒小說界的作家來說，這些作品或許還可以引申探討某一類型的知識份子(懷疑精神、嘲諷處世如同黃凡般)，如何從八〇年代反對解嚴，一路走向二十世紀末葉、二十一世紀初的軌跡。黃凡的幾個短篇如〈貓之猜想〉、〈三十號倉庫〉、〈聽啊！錢的聲音多雄壯〉，仍可感受到小說家的功力。雜揉佛理的〈貓之猜想〉，藉由人貓之間的遭遇變化，或許企圖於建構出一個可能的象徵體系，然而，這樣的問題與意義除了太

過抽象的人生哲理、與精深難解的禪宗公案之外，還能呈現出什麼呢？復出後接連推出新作的黃凡，是否可能走得太快，太急於訴說，從而忘卻了小說寫作中意義設定與閱讀理解之間的關係？

2003年從商界退休轉行寫小說的王定國及其《沙戲——生命情境·孤獨美學·王定國小說》，則展示了另一類更加專注內省、嚮往特殊美感的知識分子及其停筆二十多年後不同心境下的觀照。平心而論，王定國小說實具有相當的可讀性，各篇水準亦較爲一致。體察他者幽微、不爲人知之處，置入作家的理解與同情，人道主義的意味顯然。但越過了某一限度到了極端，是否又會形成一種意義的崩解與價值的混亂，美其名仍是多元並陳。

例如收入年度小說選的〈苦花〉，王定國似乎積極地爲倒轉各種常見的刻板印象而努力，一個出軌且當然擁有悔過可能的男子，何苦予以沈重的背負。這是否暗示著當代的意義在作者意識中，只要講出一番道理、勾勒出所以然，什麼事情都是可以在人道主義、溫情的邏輯當中平和地加以消解。又或者這位離奇死亡的出軌男子，其遭遇本身就充分具備了深刻的美感

經驗。當藝術已成為這個時代遂行各種古怪主張的護體光環之際，「以藝術之名」也已變得既沈重卻又輕佻。

張大春、李昂、朱天心、鄭清文、李永平、黃海、張系國、梅遜等幾位資深作家，亦分別出版了《鬼語書院》、《看得見的鬼》、《獵人們》、《峽地》、《艾莉亞》、《永康街共和國》、《城市獵人》、《紅顏淚》。

其中，舊作略事修訂的《峽地》，乃是善寫短篇的鄭清文少見的長篇之作，以一貫平淡的敘事風格結合平凡人物，鄭清文此次仍企圖激盪出平凡人物與尋常歲月之間的內在漣漪。《城市獵人》則為張系國民生主義系列之作。經過近三十年的盲眼生活，梅遜寫下了《紅顏淚》。至於兩位具有變色龍特徵的作家張大春、李昂，總是不甘於沿襲前作，頗為巧合地對「鬼」言「鬼」語「鬼」故事感到了興致。李昂的《看得見的鬼》，或許可以追溯到早年鹿港小鎮的民間脈絡，而張大春的《鬼語書院》，也許來自於說書人的傳統。

2004年適逢總統大選，整個台灣社會極度泛政治化的氣氛，及其影響所及的分類、咆哮、勇於主張等等情緒，多少也蔓延到小說家與小說創作。譬如年初之際，朱天心、楊照等人之

參與侯孝賢籌組的「反族群分裂聯盟」。在這樣的風潮之下，原以科幻小說著稱的黃海推出了《永康街共和國》，內容描寫虛擬的永康街共和里社區，在精神科醫師吳天喜的號召下進行了社區公投，議題正是社區的獨立，而作者也安排了全體八百多位住民一致通過的結果，黃、黑、綠三色獅子旗進一步揭示了住民渴望一種沒有黑道、色情、環境污染的社會生活。

緊接著進入文壇的寫手如駱以軍、張啓疆、吳鈞堯、彭小妍，亦分別有《我們》、《變心》、《地址》、《純真年代》等作品問世。

駱以軍繼2003年的《遠方》之後推出了《我們》，藉著斷簡殘編式的文字段落，駱以軍在書中拼貼了大量的回憶與夢境的營造，似真似幻的故事頗能讓讀者（特別是同一個世代）彷彿置身在記憶當中、時光再現。如果說駱以軍的《我們》再現的焦點在於七〇年代前後，那麼出身學院的施逢雨及其長篇《出走》，則企圖回返某一類台灣知識份子的六〇年代歷程。此外，曾於2001年以《藤纏樹》奪下聯合報讀書人獎、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的藍博洲，繼續推出了早年的長篇舊作《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恰好展示了作者本人除了對於調查、報

導執著之外的虛構興趣及其個人生涯。

其他像是大陸出身的作家，也在這一年度有新舊作品出版，這多少延續了解嚴前後知識界對於大陸文化人事物的認識脈絡，只不過歷經十餘年結合出版行銷的整理、嘗試之後，這一方面的作品卻也越來越集中在幾個作家身上，由這一年度的出版情況概可見其一斑。如虹影《鶴止步》、《上海王》、《綠袖子》，史鐵生《務虛筆記》，王安憶《叔叔的故事》（舊作繁體新版）、《愛向虛空茫然中》，蘇童《哭泣的耳朵》，張承志《南騷》，劉震雲《手機》，潘軍《重瞳——潘軍中篇小說選》，更為年輕的廖偉棠則推出短篇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

新銳方面的出手亦不遑多讓，譬如伊格言《甕中人》、高翊峰《肉身蛾》、許榮哲《寓言》、孫哲《菌類愛情》、李伊倩《深海潛行》。然而充斥整個小說書籍市場的作品，仍然以大眾文學為大宗，這樣的出版配置恐怕不太可能在幾年之內有所改觀。比較值得期待的反倒是，更多研究者深入到大眾文學、文化的領域當中，去進行多面向的研討。

三、仍然期待作家與作品

依照某些年度小說選的慣例，通常會在入選作品裡頭再行圈選出一位作家的作品，賦予年度性的桂冠。《九十三年小說選》即將年度桂冠頒給了新秀甘耀明的〈匪神〉，以「預祝他的明天」。就某一角度而言，這篇具有一定可讀性的〈匪神〉之獲選，其實也算是深刻地反映了這個時代有關意義與價值的若干問題。如同年度小說主編者陳雨航所稱，當甘耀明以「充滿天馬行空的想像力、爆笑逗趣熱鬧到不行的這一齣『甘記金光布袋搖滾』」，消解掉「多少國仇家恨、政治意識、童年往事、鄉野傳說」之際，新秀作家的歷史想像早已不再嚴肅，也早已堂堂進入到新紀元，一個以笑為中心主張以輕盈為面貌的遊戲、享樂時代。

當年度小說選往往近乎一家之言的時候，事實上，這樣的桂冠恐怕沒有太多的意義。小說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類，故事性或者敘述面的表現技巧，是為基本要素與要求之一；而一篇傑出之作，往往同時還得具備意義或者主題意識，不論它寫的是社會問題、人生現象剖面，還是現代人的自我，或個人與社會的多重關係。至於一篇象徵手法的小說要能呈現出深刻的意義，事實上遠比選擇寫實手法困難得

多。只不過，當某些讀者驚訝於不採寫實手法呈現的小說能夠如此光怪陸離、支離破碎之際，特別是又加上評論者以幾個文學術語稱讚、激賞之下，往往寧願敬畏之而不願加以挑戰「它到底寫了些什麼」、「意義何在」。正如同寫實的繪畫容易講出一番道理，而抽象畫難以陳述出所以然、好在哪裡。故事人人會講，巧妙各有不同。這大抵關乎個人的才氣與技巧的純熟；至於意義的建立，恐怕除了天才以外，都得需要認真而仔細的深入探索與反覆的設問、追尋，在種種關係網絡之間尋尋覓覓。

在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恰如其分的讚賞似乎已經不太時興。每年都會看到一批備受期待的新星，每年也都會生產一些準備著堂堂入史的一派宗師。但通常的後續情況經常也是如此，這些新星過了好幾年之後不是完全消失，就是一直還是備受期待；至於準宗師們的遭遇也許好一點，只不過數量上多了一些。這個時代我們很難再有傳說中的御史諍言，言之鑿鑿，挖掘出一條足供引導新星發光發熱的清晰道路，或者為陷入瓶頸的老作家建議出可行之路。於是，新星要嘛一一被捧上了天，要不就是一一患上慢性大頭症。久而久之，新星始終還是新

星，而老作家也還是老作家。

這個時代的文學獎，這個時代的小說創作，是否有著這樣那樣的毛病呢？

不用引經據典，也不用依靠後現代理論。這個時代的一些特徵，美其名為多元化，異質紛陳，眾聲喧嘩，實則更多的是意義的喪失與價值的廉價化。快速貶值的價值，便經常體現在形容詞的推陳出新上頭。就像信用卡一樣，金卡而白金卡而無限卡，不久之後，相信大概會有宇宙超級無敵卡一類的商品問世。形容詞的長相越來越高大，但形容詞本身卻如返老還童一般，變得越來越嬌小。

價值除了難能可貴，恐怕還是只有難能可貴。至於意義，除了透過關係網絡加以尋覓，加以體認，任何存在於單一個體之內的言說，充其量只是一種虛偽的意義——「假意」。在一個似是而非、小題大作層出不窮與虛假意義的慢性大頭症相繼登場的背景下，這個時代的小說創作，是否還能執著於真正意義的追求與嚴肅問題的探索，恐怕無法令人完全樂觀期待。但我們依然要期待未來，只不過不以溫情主義的方式一味樂觀而已。